

# 黄宽重著：《南宋地方武力——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》

陈锋

(西北大学文博学院, 陕西 西安 710069)

有关宋代军事及武备力量问题的研究,学界向来以兵制为重点,除了不少探讨兵制诸多侧面的论文外,又以王曾瑜先生《宋朝兵制初探》为全面、系统性的专著。这些研究,无疑从总体上揭示了宋朝兵制的基本内容。但是,对两宋时期出现的各种军事范畴内的活动及现象,特别是通常意义的兵制所无法包容或深入探讨的问题,则多为个案性的分析,目前做集中而细致地分析工作,尚显得不足。如宋朝军事与国防政策的演变过程、武将群体的分类与构成、中央与地方统军体制的相互关系、地方与民间武装,以及诸如蕃将之类等等问题,都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。新近出版的黄宽重先生(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)《南宋地方武力——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》一书,便是就南宋地方武力及相关问题,加以专门探讨的力作。

早在 20 世纪上半叶,已有学者关注到南宋地方义军的问题。谢兴尧发表了《南宋时之忠义军与水浒传》(《越风》1936 年 1 卷 6 期),黄现璠著、陶希圣增补的《北宋亡后北方的义军》(《食货》1936 年 2、3 卷 5 期)问世,黄现璠又发表了《南宋初年河北山东之义军》(《文化建设》1936 年 2 卷 5 期),翦伯赞发表了《南宋初年黄河南北的义军考》(《中苏文化》1941 年 8 卷 5 期)。另外,邓广铭在 1944 年撰写的《岳飞》,对南宋初期地方武力有所论及。这些论著的出现,无疑打破了旧王朝史家狭义的认识和评价。需要指出的是,当时学者们探讨这些问题的出发点,显然与抗日战争的时局有颇大关系。

20 世纪下半叶,海内外学人对这方面的研究继续扩展,其中中国大陆学者对南宋地方义军,特别是作为热点问题的农民起义军性质的论述相当热烈。主要有赵俪生先后发表的《南宋金元之际山东、淮海地区中的红袄忠义军》(《文史哲》1954 年 4 期)、《靖康、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》(《文史哲》1956 年 11 期),张家驹发表的《宋代的两淮山水寨——南方人民抗金斗争中的一种武装组织》(《上海师院学报》1960 年 1 期),邓广铭的《南宋对金战争中的几个问题》(《历史研究》1963 年 2 期),华山先后发表的《南宋初年的范汝为起义》、《南宋绍定、端平间的江、闽、广农民大起义》(后收入作者《宋史论集》,齐鲁书社 1982 年版),李春圃、何林陶《关于李全的评价问题》(《历史教学》1965 年 6 月号),白钢、向祥海出版的《钟相、杨么起义始末》(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),刘伯涵发表的《从王夫之“宋论”看南宋初抗金义军的弱点》(《学术月刊》1980 年 12 期),朱瑞熙先后发表的《南宋广西李接起义》(《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》第 2 辑,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)、《南宋福建晏梦彪起义》(《宋史论集》,中州书画社 1983 年版),汪廷奎《南宋广东摧锋军始末》(《岭南文史》1988 年 1 期)等等论著。而就防御工事的研究,以南宋钓鱼城抗蒙事迹为集中(主要有论文集《钓鱼城与南宋后期历史》,重庆出版社 1991 年版)。这些研究在探讨的范围和广度上,已超越了以往,并对南宋各种民间武装势力进行了一定的概括性的分析。但其中的某些观点,也不免或多或少带有当时政治环境的色彩。至于一些附着更多的应时性因素的文章,则不加列举。

与此同时,海外学者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。主要的成果有:孙克宽《南宋金元间的山东忠义军与李全》(收入作者《蒙古汉军及汉文化研究》,文星书店 1958 年版),陶晋生《南宋利用山水寨的防守战略》(《食货月刊》复刊第 7 卷 1、2 期),石文介《南宋初期军力的建立》(《史学汇刊》第 9 期,1978 年 10 月),王世宗《南宋高宗朝变乱之研究》(台大文史丛刊之 82,1987 年 6 月),梁天锡《南宋广东摧锋军》(《能仁学报》1996 年 4 期),李荣村《黑风峒变乱始末》(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委会编《宋史研究集》第 6 辑),苏基朗《论蒲寿庚降元与泉州地方势力的关系》(收入作者《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》,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)以及黄宽重先后发表的十篇(部)论著等。这些研究,虽因视角与大陆有别,侧重点各有指向,但都颇多地涉及了南宋地方武力本身的一些问题。其中又以

黄宽重的系列论文最为集中。

应当说，前人在对南宋地方武力的研究方面，已取得一定的成果，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也已厘清。但做系统、深入和较为完整地论述，仍然不够。从黄宽重先生《南宋地方武力——地方军与民间自卫武力的探讨》“自序”可知，作者自早年读博士时，便以南宋边境上的义军武装为研究主题。以后，又将探研的范围扩大至有关南宋地方武装力量的许多问题，前后延续多年，出版和发表了包括《南宋时代的抗金义军》、《南宋飞虎军》及《从坞堡山水寨——地方自卫武力》在内的系列论著。本书正是作者多年研究、思考的结晶，因此，本书便具有对以往研究做总结性的学术价值。故称其为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中的力作并不为过。

本书的研究视角是新颖的。作者并未将南宋地方武力作兵制式的面面俱到性的论述，因为王曾瑜先生《宋朝兵制初探》已有过系统地研究。于是，作者研究的视角集中于南宋地方武力的若干个重要方面，尤其是具有代表性、典型性的个案上，探讨其“共通之处”，以便“了解其属性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”（作者语）。作者首先选取了广东摧锋军、福建左翼军和湖南飞虎军三支代表性的地方军，在分别梳理其发展变迁过程、各自特点及其相通之处的基础上，探究南宋时期地方军所发挥的作用和局限，并揭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变化。然后，对南宋镇抚使、两淮山水寨、茶商武力和山东地区李全父子势力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地考察，继续追踪这些地方武力表象之下隐藏的各种利害关系，探讨这些武装及其领袖动向的内在原因。此外，还对南宋、高丽军民使用山城、水寨抵御蒙古进攻的效果，进行了分析和比较。通过对这些问题细致地研究，作者突破了以往对南宋地方武装较为宽泛的认识，获得了更为真实、具体的结论，使远离现实的那一段历史也增添了许多立体和生动之感。

本书注重汲取以往成果，阅读本书各章和检索附录“参考文献书目”，不难发现作者对前人的有关研究成果几乎搜览无遗，这就使本书具有了广博的学术基础，避免了自说自话的弊病。作者尊重前人成果，却并不囿于成说，往往依据自己的研究，提出独到的见解，进一步将该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。如在“福建左翼军”一章涉及蒲寿庚降元问题时，便肯定了苏基朗教授的观点：蒲氏的举动乃是泉州地方势力“以个人、家庭及地方的利益为依归，与宗室派及抗元派爆发大冲突”的结果，又指出“这一看法扭转了以往过于凸显蒲寿庚以一人一姓之力降元，以及异族人在宋代楚材晋用的看法”。但作者并未简单地停留在苏基朗先生的见解上，而是从具体分析左翼军入手，进一步论述地方势力“面对新旧政权交替之际，为维护自身及地区利益，在理想与现实之间，经过折冲与冲突的过程”。既使这一观点得到充分的支撑，也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再现了这一段史实复杂曲折的历程。

本书史料丰富、详实，征引资料繁复，却也注重对史实做深入分析，往往通过抽丝剥茧的手法，逐一揭示问题的成因所在，语言平实、可读，既没有生硬刻板的冬烘气味，也不简单地罗列大道理。如论述两淮山水寨时，除了肯定其在抗击金、蒙进犯上发挥的作用外，也从的繁重劳役、地方官的苛扰、地方和民众利益的冲突、地方势力的纠葛等等方面，发掘两淮山水寨所承受的困境，指出其在某些情况下曾出现态度复杂、摆动的现象。这便深化了传统意义上对义军的见解。对李全父子政治动向的分析，是从当时背景下的政治抉择与经济利益的影响两方面因素，实事求是地考察李全父子的完整变化过程，其最终蜕化结局也自然在情理之中。也突破了以往“或从民族大义的角度看待李全父子，或从农民起义角色讨论李全兴起的因素”的简单化理解。李全不是彻头彻尾的民族变节者，也不是崇高的反封建英雄，而是那个复杂变化时代崛起的地方领袖人物。需要强调的是，作者通过对诸多各案的分析，总结性地指出：在面临强大外患及内乱的威胁下，南宋政权接纳了地方的武装力量，创立新的制度，对北宋强干弱支政策进行了一项重大修正，“反映了南、北宋政权不同的特质”。而地方武力不仅与南宋正规军并存，更是支撑赵宋政权延续的武装力量。这些结论，无疑准确地触摸到两宋政治发展及演变的重要经脉，深化了南宋史的研究。反映了作者不喜空论、注重史实及其完整性的治学特点。

黄宽重先生长期专注于本课题的探索，“十年磨一剑”，心无旁骛，从而对南宋历史上的地方武装力量的一些问题，做出了超越前人的成绩。当然，就南宋地方武力的所有问题而言，本书仍不可能完全论及，也就是说，仍留有許多空间可以继续扩充。如南宋四川地方武装等问题，便需要进一步探研。

作者在自序中也指出：“南宋地方武力的名称复杂，任务有别，牵涉的范围广泛，要进行全面、完整且深入的研究并不容易。”但本书为这一专题的继续研究，无疑奠定了雄厚的基础。另外，本书也存在个别值得商讨之处。如作者将茶商武力也视作南宋地方武装，似可商榷。诚如本书所论，茶商之有武力，乃在于保护走私活动。故其应被视为南宋政府的敌对力量，这无论与广东摧锋军、福建左翼军、湖南飞虎军，还是与交界地区的镇抚使、两淮山水寨，甚至与归顺宋廷的李全父子武装，都具有不相同的性质。至于茶商走私武装被收编到宋军后的情况，则已与茶商武力本身关系不大。本书第 313 页所提及的武休关，作者注在今陕西留坝县，此当为印刷之误。陕西有留坝县，而无留坝县，武休关也恰位于陕西留坝县南。

**收稿日期：**2003-10-31

**作者简介：**陈锋，男，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。